

四城学者在杭州相遇,共话“城市与阅读”—— 银杏树下,静听四城“书话”

本报记者 高心同

前不久,西湖边一棵200岁的银杏树立在晚风里,听四城文学大咖“碰”了一夜文化的茶盏。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它所在的杭州“阅见西湖”书店院落,来自香港、澳门、深圳、杭州的四城学者——文学评论家、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黄子平,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资深媒体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驻校作家胡洪侠,经济学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围绕“城市与阅读”主题展开对谈,分享各自城市的文化特色、阅读生态。

到底什么是“文化沙漠”?各城的阅读现状和城市文化内涵有何关系?让我们和这棵银杏一起听听看。

我们不是文化沙漠

“提到香港,就有人奉上那声定论:哦,文化沙漠。我只能说,如果真是这样,香港的文化内涵可就是沙漠里的仙人掌了。”从人们对香港的刻板文化印象开始谈起,一个常扣在大城市头顶的帽子,被黄子平端上桌了:“文化沙漠”。

这个“帽子”从何而来?

“近现代以来,文化的主轴始终是文学。然而香港属于什么呢?过了那个村没那个店了。”黄子平轻飘飘一句自嘲背后,是香港因为错身现代文学主脉,文学发展滞后的遗憾现实。

然而,他提醒我们,将“文化”的概念打开来,跳出狭窄的“文学”定义,我们会发现,以电影称道的香港,不仅不是“沙漠”,反而有它独特的文化。

费解吗?打开你的视频软件,点击你的音乐软件,你会发现,荧屏上、耳机里,香港的文化从未真正退场。20世纪80年代,“小马哥”一袭黑衣,拿钞票点烟的模样,让多少青年在录像厅里如痴如醉。张国荣、Beyond、林忆莲、陈慧娴、王菲……这些被我们父母一辈贴在墙上的偶像,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上粤语歌的声名鹊起。一枚枚香港影音符号,影响丝毫不比文学寡淡,甚至在跨地域传播中更具穿透力。

“香港电影的影响力甚为深远。地域上,它的辐射范围远至东南亚。时间维度上,直到现在,香港电影还是很多动作片的老师,深刻影响着当代电影制作的逻辑思路。”为那些想要深入探究的好奇人士,黄子平特别推荐了香港电影的研究著作《香港电影的秘密》——这部作品从学术视角,解码了香港电影如何在光影流转中,打造跨地域、跨时代的文化坐标。

为何有人提出“文化沙漠”的质疑?黄子平揭示,这个问句,暗藏着某种焦虑、一缕呼唤,抑或一种期待。无论具体心绪为何,提问者往往是搞文学的人。

他提到,香港的文学作品中,众多城市地标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城市记忆。譬如香港一些小小的二手书店,已经不仅是实体的售书场所,更成为香港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这些堆满书籍的狭小空间,见证了无数文学青年的成长,也孕育着香港的文学氛围。张爱玲在香港的经历及其创作,使香港的一些场景成为文学经典中的元素。她笔下的香港,像《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家,充满了欲望与算计,成为特定时代香港社会的缩影,这些场景让读者对香港那个时期的社风貌有了深刻印象。

“文化沙漠”这个标签,仿佛一支曲子里的不和谐音。在场的文化人,当即肃穆了表情。

这不,黄子平身边的王笛也接过话茬,开始为澳门“辟谣”。

“澳门也不只是大众认知中的那样,只是一座赌城。你要了解澳门,眼中就不能只看到澳门的灯红酒绿,要知道它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要知道第一部由马礼逊编撰的英汉词典在这里出版,第一台印刷机也在这里诞生。”王笛提醒大家,16世纪以来海不扬波的澳门,非但不是“文化沙漠”,反倒是城市文化研究的宝库。

大三巴牌坊、威尼斯人、猪扒包……澳门像个旋转的宇宙球灯,在每个到访游客的心中,投下陆离光影。然而,王笛让我们侧耳倾听,越过那车水马龙,穿越那市井繁华,这座城的地表下,湍湍流淌着文明之音。

澳门的历史文脉,不曾断裂,也并不神秘。它就在街头巷尾,比如——

澳式菜肴里传承百年的古法,工匠手中代代相守的质朴手艺,还有像郑家大屋这样保存完好的百年老宅……它们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这座城市跳动的“活化石”。



左起:王笛、黄子平、罗卫东、胡洪侠。



活动现场认真聆听的读者。

借着这些鲜活的引子,王笛带我们探向澳门的文化肌理。他笑谈,今天刚来现场,听到他人误称澳门只有一所大学,事实上,这座城市已有六七所大学了。它们也并非沉默的象牙塔,而是一个个文化引擎——组织发起文化节、读书节及公共史学项目,书店里充斥着学者关于文史哲的讨论,是澳门的日常文化景象。

“我认为澳门大学会成为澳门的一个品牌。因为在这所学校,历史阅读与写作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而是像我近几年反复强调的那样: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普通人也在研究宏大叙事。”一则突然插播的“招生广告”,结束了王笛的城市文化科普。一旁的胡洪侠忍不住辣评:“这个招生广告打得正是时候,因为过几天就高考了!”

有人的地方就是“文化绿洲”

“文化沙漠”上吹拂着“文化焦虑”的风沙。为躲避风沙,深圳又会建一个怎样的绿洲?

胡洪侠告诉我们,为此,深圳开启了一场时长25年的“高贵的坚持”——深圳读书月。

从2000年起,每年11月1日至30日,深圳都会迎来这场冬季的“保留节目”。由此配套衍生出许多知名品牌活动,如深圳读书论坛、经典诗文朗诵会、年度十大好书、领导荐书、诗歌人间、中小学生现场作文大赛、书香家庭评选、赠书献爱心、绘本剧大赛、青工阳光阅读读等。

为什么在深圳这样一个刚刚兴办的特区里,办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民阅读活动?

胡洪侠解释,这个行为,可以搭配深圳的那句标语“让一座城市因热爱阅读而受人尊重”一同食用——它们言说着深圳人的文化焦虑,即在文化意义上得到尊重。

即便如此,依然会冒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你们深圳人每年11月才读书。”胡洪侠则反击:“你们11月连书都不读。”

至于“文化沙漠”这顶帽子,胡洪侠说,当然没人愿意戴,因为戴了就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没文化。

他进一步解构称,这个概念从来是一场“流动的傲慢”:它总被扣上新兴工商城市的“帽子”——伦敦曾以此不屑纽约的“浅薄”,转头,纽约又用这个蔑称讥讽洛杉矶的“庸俗”。

这可不是玩物丧志的玩,也不是玩世不恭的玩,而是“雅玩”,是对东方生

“你看,这顶帽子仿佛一定要传递一样,好像不传递的话,就没有效力。但自从深圳办了20多年读书月活动,关于它‘文化沙漠’这个呼声渐渐就少了。”

有段时间,各城的文化人都在为这个称呼焦虑和自我申辩。但胡洪侠觉得,大家没必要焦虑,本质上,就没“文化沙漠”这回事,有的地方就都是“文化绿洲”。

当然,深圳人早就被文化焦虑裹挟。胡洪侠此前翻看1980年代的深圳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发现大部分投诉集中在:深圳书店太少、太小、太脏乱。还有人质问,为什么偌大的深圳,没有一个书摊或报刊亭?甚至连一本《读者》都买不到?

胡洪侠是懂得深圳人的,他明白,这种焦虑,就是因为深圳人知道如果不向书本、他人和世界学习,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更深一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人对文化的渴望。这渴望并不来自什么高贵的阅读天性,也不是什么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阅读传统的延续,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全民学习浪潮的翻涌。

“文化沙漠”和“文化焦虑”,从来不是一座城自卑的叹息,而是它清醒的自我认知。当其他城市还在为“是否被贴上沙漠标签”争论时,深圳早已用行动证明,文化的厚度从不取决于历史长短,而在于对精神文明的持续追求。

从“文化沙漠”到“阅读典范”,这场跨越40年的蜕变,藏着现代化进程中最动人的注脚——阅读改变命运,深圳正是这句话的试验场。

“如果大家还对这座城有什么好奇之处,欢迎大家今年11月来参加第26届深圳读书月。”胡洪侠挥挥手,笑着向观众发出邀约。

阅读不是功利的

“杭州的名堂,大部分都是发烧友玩出来的。在这种地方,阅读不可能是功利的。”当讨论来到杭州和阅读,画风陡转——飞越了沙漠,也不见了背包客。“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作为一名在杭生活近50年的“新”杭州人,罗卫东挖出了杭州的精神内涵——“玩”。

这可不是玩物丧志的玩,也不是玩世不恭的玩,而是“雅玩”,是对东方生

书评

《义乌七章》出版:

解读义乌发展千年文化密码

周华诚

义乌这座城市,素以“世界小商品之都”闻名。当人们惊叹于义乌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时,往往忽略了其另一重身份——它其实是一座承载了千年文化密码的城市。

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义乌七章》一书,分别从孝亲、听禅、读诗、尚勇、崇文、治愈、生意等维度切入,以七篇文化大散文,将义乌的历史肌理、人文精神与当代生活编织成一部厚重的灵魂叙事。该作品不仅是对义乌城市文化的深度解码,更为中国城市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典范样本。

七个关键词,七篇大文章,讲述一座城市的七个核心文化,每一章既是独立的文化切片,又彼此勾连、共同构建起义乌的精神谱系。《咏鹅》一章聚焦初唐诗人骆宾王,从《咏鹅》的童真到《皇帝篇》的慷慨,义乌的诗歌传统被赋予“向天而歌”的浪漫气质。《渡磬记》则从古镇佛堂的故事讲起,贯通义乌作为佛教文化重镇的古今。禅与诗的呼应,构成了义乌文化的灵性底色。《忠勇的力量》以宗泽抗金、义乌兵筑长城的壮烈往事,诠释“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尚武精神。《永远的绣湖》则展现了义乌“绣湖清,出状元”的文脉绵延。文与勇看似矛盾,却在义乌人身上达成奇妙的统一,文人敢为家国拔剑,武者亦能提笔安天下。《大医》一文,借朱丹溪的“滋阴摄养”理念,将中医之道升华为对人性与天理的参悟;《文人与慈鸟》一章,则通过颜真卿“衙前舞”的传说与婺剧《白蛇传》的创作,将孝道凝练为义乌人的精神图腾。终章《生意》以义乌江为线索,串联起佛堂古镇的盐埠码头、田心村的火腿传奇,直至国际商贸城的全球网络。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商道不仅是财富神话,更是江南农耕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转型的缩影。

正如书中所述:“义乌江自东向西逆流而行,恰似义乌人骨子里的叛逆与闯劲。”中国不乏历史名城,但许多城市的文化书写陷入两种困境:或沉溺于地

方志式的资料汇编,或流于口号化、标签化的形象宣传。《义乌七章》一书的成功,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活态文化”的润物细无声的书写范式。

《义乌七章》的写作风格,堪称文化散文的有效实验。作者们以“在地行走”的姿态,将宏大叙事解构为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历史与当下在文本中自然流淌。书中极少堆砌史料,而是通过具体人物的生活史折射时代。

城市文化如何书写,《义乌七章》提供了范本意义。本书邀请的七位作家深入义乌,他们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

在作家的视角中,在地性与专业性取得了巧妙的平衡。如作家许丽虹为写朱丹溪,研读医书、走访后人,最终将“滋阴理论”转化为对现代人生存环境的反思;作家成尚阳在骆宾王公园与白鹅对视,从“红掌拨清波”中读出义乌人“逆流而上”的生存哲学。作家的感性视角与学者的严谨考据结合,让文化叙事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传统的地域性知识与记忆,往往受限于地域,难以传播得更远。而《义乌七章》的写作,有效突破了这一局限,通过系统梳理与文学转化,将文化故事的讲述,取得了令所有读者都能共享共振的效果。这让人想到,其实任何一个地域,不论其面积规模大小,只要挖掘得够深够广,书写足够耐心,共振的点找得足够巧妙,都是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供利用的。

可以说,《义乌七章》一书是城市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古迹或创造了怎样的GDP,而在于它能否将自身的生命经验转化为精神价值。义乌文化的七个关键词,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也是人类共通的文明密码。

对于其他城市而言,这本书的启示或许在于:讲好自己的故事,需要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让每一块砖瓦、每一句方言、每一段记忆,都成为照亮未来的光芒。

诉说孩子质朴的善意 ——评毛芦芦长篇儿童小说《戴响铃的秘密》

郑春霞

毛芦芦新近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戴响铃的秘密》能引起孩子关于“生活之美,生命之重”的童年思考。

这是一个笑中带泪的故事,讲述了几个纯真、善良的孩子冒着被责骂的危险,又一次一次地解救被恶虐虐待的紫薇花小屋里的残疾老人的经历。

毛芦芦将笔触又一次指向了农村。这里的鸣鸡犬吠、竹林桃园,庄稼地、稻草蓬,依然为我们的文学作品提供着取之不竭的养料。毛芦芦写这些是得心应手的。这不仅因为她本身就生长于其间,也因为她的气质里始终保持着与土地、田野融为一体的一份朴实与真诚。

最先出场的赖妙妙是个胖绣娘,作者把她写成“虎背熊腰”“小肉山”“大熊”“赖熊熊”,总是低着头,用香肠一样的粗手指,捏着一根细细的绣花针,在一块白布上绣着一朵朵牡丹花,真有点“张飞绣花——粗中有细”的即视感。

要说她人不好看吧,性情也木讷。成天只知道低头绣花,别人跟她说话也不搭理。而主人公戴响铃则瓷实、厚重、粗犷,像个大大的土瓮,能打架,敢骂人,是个叽叽喳喳、没心没肺的姑娘。用赖妙妙的话说,就是“名字叫响铃,人也像响铃,丁零丁零总是摇来摇去,吵死了,烦死啦”。

两个农村女孩,一个不乖巧,一个不温柔。但是,这样的人物设置不是为了作者偏爱或是讨喜读者,而是让人物在其成长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真实地存在着。

在此之前,毛芦芦著有“亲亲自然系列”散文集,包括《鹭鸟日记》《我们抱山去》《跟着小溪去远航》《我是大自然的孩子》四册。我们总是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草木葱茏、万物生长的气息。她也把这一脉气息流入到小说中。

乡村与自然十分相贴。毛芦芦笔

下的乡村,有着“格外皎洁的圆月。月光倾泻在满池的花朵上,将那些紫莹莹的花朵也染白了”,有着“月光如水,蝉鸣如潮。早稻已经收割,晚稻也已经插下,月下的稻田变成了一个个闪着银光的小水塘”。

小说将残疾老人雨萍婆婆的容身之所安放在一个周围种满紫薇花的小屋子里。这些紫薇花是雨萍婆婆年轻的时候亲自种下的。而此刻,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的雨萍婆婆却是如此不堪:头发花白、脸蛋黝黑、瘦骨嶙峋,脾气还很差,看上去古怪又可怕。由于长期没人照料又无法行动,常年睡在散发着臭味的稻草堆和脏被子中。在小说结尾,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勇敢将雨萍婆婆解救了出来,让她回归到了诗意、温馨的氛围之中。

所谓“公案难断家务事”,成人世界各有各的难处。但孩子们却不这样想,他们天性的纯真、善良比大人纯粹、坚定多了。他们冒着被打骂的风险,也要一次次给雨萍婆婆送吃的,陪伴着她,给她些许的安慰。他们对于雨萍婆婆的遭遇能够感同身受,心急如焚。他们还想找到绝妙的办法,用舆论引导“坏人”承认错误,从而解救了危难中的雨萍婆婆。

戴响铃、赖妙妙勤劳、粗壮、耿直、勇敢,有着一脉相承的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她们身上带着本真的土气、泥气、乡野之气。当然也少不了瘦瘦的大骨架男孩“机器人”以及那个被唤作“乡下妞”的城里男孩,还有那个被唤作“煤粒子”的黑小子。在一起策划、实施解救雨萍婆婆的过程中,他们也表现出了小小男子汉的勇敢与担当。

毛芦芦笔下的小人物们小小智慧不少,人小力量不小。新时代的乡村图谱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而变得更为诗意图。

书讯

《四海创生》

金庆伟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基于作者实地采访、实际案例,本书突破传统地域经济研究框架,以永嘉学派“事功学说”为理论密钥,系统解码温州华侨经济跨越山海的发展逻辑。其不仅为“文化基因—商业文明”互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更以全球视野审视温州模式的当代转型,探讨地方经济破局、华侨群体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

